

新中国 60 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述评

支振锋 臧 劼

2008年12月2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52位海内外著名学者围绕“中国模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中国模式的前提与必要性

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与会学者都认识到,历史是连续的,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也是在60年共和国的风雨中被磨砺出来的。与会学者认为,任何一个大国、任何一个文明的崛起,一定要有一个有吸引力、有辐射力的思想作为基础,一定有一套成熟的制度作为保障,探寻这种思想和制度就是总结“中国模式”的意义。有的学者指出,虽然有不修当代史的说法,但当代人对当代历史特有的直觉、特有的现实感是后来人难以捕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讨论中国模式。

从政治上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政治框架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奠定的。与其他一些后发国家相比,主权性的保障是中国所有独特性的前提,保证了改革的主动性。“中国模式”,是一个演进的结果。它的基础也许更深厚,不止30年、60年、100年,还可能是600年、6000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深厚的,这是任何方法、模式的总结不能忽视的。“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个与美国梦不同的“中国梦”。

有的学者提出,西方学界已经在探索“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认为这是对西方世界“三百年来未有之挑战”。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术思考能力远远落后于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和政治家们的判断力,以至于我们在经济改革领域中创造不出不同于西方“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反而是西方经济学家。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如何理解它?如何评价它?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功?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国际社会缺乏认识,连我们自己也缺乏认识。当下的中国模式不仅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应有的认同,更缺乏来自国内的应有的认同。

有的学者从中国模式对多元社会的重要意义方面提出,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与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未来西方历史将不再是唯一的参考架构,也不能用简单的形式化指标来界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里没有先验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与价值体系都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土壤、不同历史条件下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时间的淬炼才能取得其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还有的学者也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式现代化模式造成严重的挑战,其独特之处在于共产党政权能够掌握何时、何处以及如何采用外来的观念的政策主动权,其本质在于实施务实的以及试验性质的改革道路和强调经济成长与政治稳定的政策。

二、怎样总结“中国模式”

学者们认为,多年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有一个有迹可循的模式,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其它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今天,中国迅速发展,国力综合提升,整个社会在进步,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充满了吸引力,说存在有“中国模式”是没有问题的。

有的学者指出,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只有13个国家保持7%以上的增长超过25年,在历史上只有8个国家保持7%的经济增长超过40年,而中国都是其中之一,最起码说有“中国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模式”不仅是一个理论讨论的问题,还是一个行动的指南,或者说也是对现实的一个定义,是对我们过去的总结。

如何总结中国模式呢?有的学者认为,模式不是说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而是它是怎么组成的;与模式有什么内容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模式形成的原则,特别是决策原则和政策原则。一旦我们认为可能存在“中国模式”,就要去为这个模式总结出精炼的关键词,找出中国模式致胜的秘诀。

三、中国模式的内容

(一)政治模式

与会学者对西方政治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不少人认为中国政治发展之路,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模式”。有的学者批评了一种认为变化就等于民主化的西方和自由派的偏见,他认为中国虽然拒绝了以多党制为基础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但是并没有拒绝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经验显示,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一党执政,排除了西方式的“民治”程序安排,更有机会实现“民享”的目标。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而走出来的道路和途径;它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时空交错的政治原则。

有的学者认为,集权为民是中国政治的显著特点,该学者总结了我国选举模式的六大特征:1. 重视普遍性、广泛性和平等性的原则。2. 以高度的组织性、动员性和明确的导向性来坚持选举的政治原则。3. 以规范性的程序要求制度的同一性。4. 带有非常强的指标性,对某些群体有指标要求。5. 强调选举的合作性,而不是对抗性。6. 形式上的高参与率与实际上的政治统筹。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今天,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如果我们的宪法学研究依然对此充耳不闻,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视而不见,若非心智的孱弱,那就是彻底放弃了宪法学思考的责任。

有的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民本”政治模式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革命中体现了目标和组织手段的先进性,在中国当代建设事业上依然体现着明显的、不可替代的先进性。

(二)经济模式

有的学者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考察,总结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特征。一是有两个大体对称的反向的历史过程:从计划市场混合型经济体制到单一公有全面计划体制的过程,与由此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二是两个过程都由党和政府主导,这是两次变革都能比较平稳进行的重要原因;三是在这两个过程中,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市场经济的规律事实上都在发挥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则认为,中国这种后发型工业化与西方殖民主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是在资源严重短缺、人口最多的大陆型国家里只能靠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这就形成所谓“中国特色”最为关键的机制,就是 1950 年代政府集中使用了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功地替代了稀缺程度接近于零的资本要素、大规模投入国家工业化所必须的大型基本建设。

当前,金融危机的发生吸引了与会者的注意力。有的学者将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归纳为 5 个方面:第一,始终坚持政府对金融的主导地位。第二,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的情况是逐渐改革的。第三,在监管评价标准上,除借鉴了国外一些成熟的技术与管理方式外,还有一个更加灵活和外部化的要求:让人民满意。第四,在学习西方的评估监管标准之后,我们还有一把手的责任制,一把手会和监管机构签责任书,一层层签下去。第五,文化对金融的一种良性触动,比如中国文化中的“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等等。

有的学者从劳力、土地、货币这经济三要素出发,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组成:(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2)国有的金融及大型企事业单位;(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4)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他认为中国经济模式解决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削弱这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摧毁中国经济模式,摧毁中国经济。

(三)社会模式

有的学者对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行了再思考,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刚性二元结构,而是柔性二元结构。农民可以进城,进城失败,他们也可以返乡。正是农民可以回得去,他们就不必在进城失败之后,不得不沦为城市贫民窟的一员。而正是中国农民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返乡,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就使得中国具有很强的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就可以让经济周期仅仅是经济的周期,而不变成政治、社会的危机。

有的学者认为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是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最大奇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中国减贫的 60 年实践表明,必需探索具体的适合自身国情的独特真理。

人力资源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而医疗卫生则又是保证人力资源丰富和健康的前提。有的学者从经济学增长的角度探讨了人力资源在最近 30 年以及 60 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她分析了抗美援朝以后的爱国卫生运动,认为中国通过当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发动群众,通过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创立了自己的医疗模式。正是这个医疗模式为中国滋养了无数智慧而又健康的国民。可惜到了后来,这个模式被抛弃了。

还有的学者总结了中国对外关系模式:1. 中国现代化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2. 中国的大国梦目标与二战后其他国家的目标有所不同。中国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正义的、强国受到制约而弱小国家得到优待的、彻底不同于以往实行霸道的列强所建立的世界体系。3. 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4.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是中国成为大国倚重的力量,中国主要从发展中国家得到道义上的支持。

综观这次研讨会,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 60 年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总结“中国模式”却难乎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是对中国发展奥秘的探寻,是对中国未来成败的关注,是对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呼唤的一次回应。

作者:支振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市,100720)

臧 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100871)

(责任编辑:田改伟)